

申江赤魂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纪事

上海通志馆

编

上海滩杂志编辑部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
《上海滩》丛书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上海滩》丛书

申江赤魂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事

上海通志馆
《上海滩》杂志编辑部 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申江赤魂：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事 / 上海通志馆，
《上海滩》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8.8

(上海地情普及系列.《上海滩》丛书)

ISBN 978-7-5671-3211-5

I. ①申… II. ①上… ②上… III. ①革命纪念地—
介绍—上海 IV. ① K87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9004 号

责任编辑 陈 强
装帧设计 缪炎栩
技术编辑 章 斐

申 江 赤 魂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事

上海通志馆 编
《上海滩》杂志编辑部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44)

(<http://www.press.shu.edu.cn> 发行热线021-66135112)

出版人 戴骏豪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10mm×960mm 1/16印张21.5 字数306千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71-3211-5/K·185 定价 48.00元

《上海滩》丛书前言



1987年,《上海滩》杂志由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创办以来,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坚持“以介绍上海地方知识和各方面建设成就为己任”的办刊宗旨,坚持用说古道今的方式、生动具体的内容,为“讲好上海故事,传播上海精彩”,为“让世界了解上海,让全国了解上海,让阿拉了解上海”,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自创刊31年来,《上海滩》已持续出版了380多期,发表文章近3 000万字,图片2万多张。其中不乏名家名作、鲜活史料,还有大量珍贵历史图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上海滩》杂志出版丛书,一直是广大读者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常年工作计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2000年,我们就应广大读者要求,出版了一套六册的丛书(约120万字,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颇受读者欢迎,短短几年就销售一空;2004年,我们又应读者要求,编辑出版了一套《上海滩》精选本,同样受到读者青睐,纷纷前来购买;2017年1月,我们在庆祝《上海滩》杂志创办30周年之际,决定根据广大读者的要求,继续出版《上海滩》丛书,当年就出版了一册《文化名人笔下的上海风情》(2017年10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今年将再推出一套四册《上海滩》丛书,分别为《申江赤魂——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事》《海上潮涌——纪念上海改革开放40周年》《楼藏风云——上海老洋房往事》《年味乡愁——上海滩民俗记趣》。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更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深情地指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

申江
赤魂

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这里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的确，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上海曾经是党中央的所在地，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在上海召开，并且领导了上海乃至全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之后，上海依然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31年来，《上海滩》始终坚持发掘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的光辉事迹，弘扬优秀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发表了大量的讲述优秀共产党员英勇事迹的文章，同时也刊登了许多寻找和讲述设在上海的党中央以及省市机关的经历和精彩故事。

今天，我们为了实施“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在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发掘中国共产党最本源、最纯粹的文化基因、精神灵魂和历史根脉，我们从历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章中，遴选出部分精品力作，编辑出版《申江赤魂——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事》，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的需求。

上海又是一个具有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的国际大都市。因此，上海在170多年前开埠之后，就以开放的胸怀，接受和融合各种外来文化，形成了有着鲜明色彩的海派文化。尤其是距今40年前的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后，上海更是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不仅在建设“五个中心”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在城市交通、苏州河污水治理、城市绿化等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上海市民在住房、教育、医疗、旅行等衣食住行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获得感”。

《上海滩》正是创刊于改革开放大潮呼啸奔腾之际，所以，《上海滩》创刊伊始就将及时报道和记录上海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自己神圣的责任。31年来，上海几乎所有重大改革举措及其取得的重大成果，《上海滩》都及时作了报道，比如，建设第一条地铁、架起南浦大桥、苏州河治理工程、宝钢建设、桑塔纳轿车引进、股票上市乃至老城区与棚户区改造、一百万只马

桶消失等一系列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都见诸《上海滩》。为此，有些读者赞誉《上海滩》是上海改革开放伟大成果的忠实记录者和热情宣传者。我们从中精选了一部分优秀文章编辑出版《海上潮涌——纪念上海改革开放40周年》，以纪念上海这波澜壮阔的40年。

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尤其是设立租界之后，上海便逐步形成一个华洋交集、五方杂处的十里洋场。各国列强在侵略和掠夺我们的资源的同时，也将一些西方文明带入上海。比如，他们在建造纵横市区的宽阔马路的同时，还沿马路严格规划建造了一片片洋房区。这些洋楼风格多样，设施先进，花木繁盛，环境优美。为此，上海获得了“万国建筑博览”的赞誉。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洋楼里居住的不仅有各国的“冒险家”们，还有许多我国社会各界重要人物。比如孙中山曾在今香山路洋楼内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而取得了北伐革命的胜利，同时，他和夫人宋庆龄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得的温馨岁月；再比如京剧大师梅兰芳在抗日时期，在上海家中蓄须明志，誓死不为日寇演戏，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民族气节和凛然正气；至于位于思南路上“周公馆”里的同志们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的故事，则更是家喻户晓。这些洋楼里激荡着历史风云，蕴藏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多年来，《上海滩》既注意组织采写这些洋楼的建造史，更注意发掘居住在这些洋楼中的各界人物的精彩故事和革命精神。这些洋楼故事成了广大读者最喜欢阅读的内容之一。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读到这些精彩的洋楼故事，我们编辑出版了《楼藏风云——上海老洋房往事》。

上海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据考古发现，早在约6000年前就有先民在上海地区生活、劳作。在之后的数千年历史中，上海人民不仅创造了许多物质财富，而且还创造了许多优秀的精神财富和灿烂的文化，民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上海滩》在注意发掘刊登西方文化给上海带来的重大变化的同时，也非常关注上海地区民俗文化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上海滩》从创

刊初期就设立专栏，专门挖掘和刊登有关上海地区民俗文化方面的趣闻轶事。内容涉及年节习俗、婚丧嫁娶、清明祭祀、中秋团圆等方方面面。读了这些文章，广大读者可以了解上海悠久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尤其是那些常年在外奔走的游子常常会生出一丝淡淡的乡愁。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读到这些满含乡愁的文章，我们专门编辑出版《年味乡愁——上海滩民俗记趣》。

上海是个“海”，浩瀚无垠，深不可测，蕴藏着无数的宝藏。31年来，《上海滩》仅仅拾取了海滩上的一些贝壳，捧来了海面上的一些浪花，那些深藏在海中的宝藏还远未发掘。因此，随着《上海滩》杂志的继续出版，上海历史文化中的许多精彩内容不断被发掘，《上海滩》丛书的出版内容将越来越丰富。所以，目前这四本书仅仅是庞大的《上海滩》丛书计划中的一小部分，我们将继续努力，每年编选几本，积少成多，希望在若干年之后，能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和珍藏需求。

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王依群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上海滩》杂志主编

目录

- 1/ “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
- 8/ 670万人走向兴业路
- 13/ 中共一大会议中的突发事件
- 27/ “大东命案”与“一大”会期考证
- 35/ 石库门里的红色火种
- 51/ 上海最早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 54/ 《资本论》中译本在上海印行
- 57/ 党的领袖寓居上海的时候
- 64/ 列宁派到上海的特使
- 75/ 中共二大纪念馆激荡着历史风云
- 84/ 中共四大纪念馆里的故事
- 94/ 毛泽东报道：崇明农民暴动
- 107/ 血染南京路
- 117/ 周恩来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 124/ 周恩来在北站前线
- 131/ 腥风血雨“四一二”
- 137/ 福兴字庄：党中央在上海最机密的机关
- 143/ 她的父母瞿秋白杨之华

- 158/ 踏勘1935年陈云在上海的革命足迹
- 165/ 方志敏“漂流”上海滩
- 173/ 鲁迅会见中共上海领导人
- 177/ 党人魂——记潘汉年
- 201/ 卢绪章：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 218/ 张纪恩腹藏党史风云
- 235/ 沈安娜潜伏敌营十四年
- 251/ 中共上海地下金库
- 264/ 中共上海地下文库
- 273/ 我的父母奉命掩护中共上海局
- 283/ 紧急接送红军游击队到皖南
- 293/ 保卫周公馆
- 298/ 新新美发厅的地下党员
- 308/ 大上海接管亲历记
- 317/ 重游龙华警备司令部
- 322/ 寻找“龙华二十四烈士”
- 334/ 后记

“一大”会址是怎样找到的



沈之瑜

请周佛海的妻子协助寻找

1950年9月的一天，姚溱同志打电话给我，要我到市委宣传部，说有事商量。我立即赶去见姚溱同志，他说市委领导决定要千方百计找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并建立纪念馆。此事叫我和杨重光两人负责。我说：“任务很光荣，但难度极大，我只知道当年‘一大’是在法租界开的，这样大的一个法租界到哪里去找？”姚溱说：“你别急，我已和扬帆同志讲好了，找来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请她协助你们找。”我听了很高兴，从宣传部出来就直奔图书馆，从封存书刊里借到一周佛海的《往矣集》，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把此书看完，从中只得到这样一条线索：“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隔了一天，我们和杨淑慧会面了。她首先带我们去的是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铭德里2号）陈独秀家里，她说：“当年开会时陈独秀在广州，这里只有他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楼上，开会期间李达、王会悟夫妇还住在这里，后来我和周佛海结婚之后也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深。”我们前前后后走了一圈，这是一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弄堂房子，她边走边看边说：“大门进来的客堂是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的。”“旁边的厢房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们来到客堂后厨房前一个狭长的过道小天井里，她说：“这里原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时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

申江
赤魂

放水浸西瓜。”因为当时还有居民，所以没有上楼。这虽不是我们要找的主要目标，但这里是我党成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新青年》从第8卷第1期开始便成为我党的党刊，所以这里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遗址。

我们问杨淑慧：当年“一大”开会的地址在哪里？她说：“我去过几次，但印象没有这里清楚。”我说：“《往矣集》记载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开的。”杨重光同志说：“我看到的材料记载是在蒲柏路上的博文女校里开的。”杨淑慧说：“李汉俊家在贝勒路没有错，几号门牌我记不清了，我想到贝勒路去找找看，能不能凭当年的印象就能确定，没有把握。”我说：“我同意，改日我们去贝勒路。”杨重光同志说：“我们双管齐下，我去蒲柏路访问老居民先把博文女校找到再说。”我请沈子丞同志去市教育局找解放前的学校资料，有没有博文女校的校址。过了几天，他来告诉我，当时上海的中、小学都要在7月13日之后才放暑假，7月1日还在上课，不可能在那里开会。当时，人们都认为：7月1日作为建党纪念日，一定是“一大”开会日。

总算找到一点影子

过了两天我约杨淑慧去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踏看。我们两人慢慢地边走边看，她说：“我仅有的一点印象现在影迹皆无了。当时李家前门沿马路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有一片菜地，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小厂，房子造好不久他们搬进去住的。所以是新房子，他们家里进出走后门的。现在鳞次栉比都是房子了，昔日的影子也没有了。”我们走到望志路（今兴业路）附近，看到有两条弄堂，弄堂口上部建筑是圆形的，弄里一边是一排后门，另一边是一排石库门。她忽然说：“这里有点像李家后门！”但是哪一家一时确定不了。我看她走累了，我说：“今天总算找到了一点影子了，我们改日再来吧。”杨重光同志访问蒲柏路老居民，总算找到了博文女校，是在白尔路（后改蒲柏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据查当年校长是黄兆（绍）兰。1951年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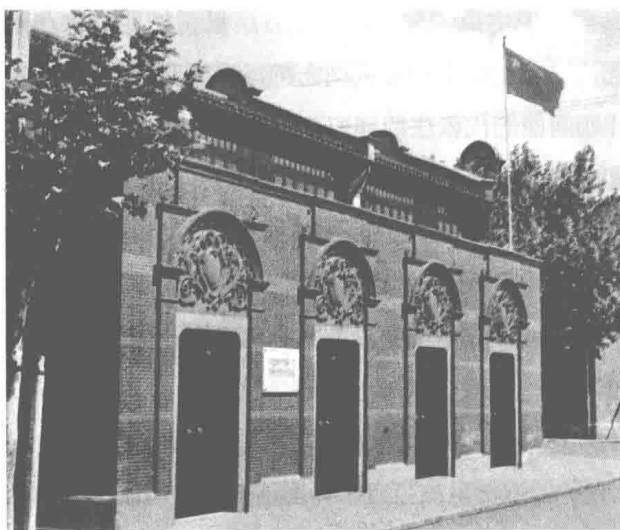
月，杨重光同志拍了一套照片送中央领导同志审核，结果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的：“胡绳同志说，毛主席和董必武同志都已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代表住的地方，开会的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我去农业部见了李书城同志，他告诉我那时他的家在法租界望志路78号，现在路名和门牌号都改了，因此他只说了那所房子的大体位置，于是我返回上海继续寻找。”

博文女校也是革命遗址

在博文女校召开“一大”的说法虽被否定了，但这座女校还应该作为革命遗址保护纪念的。学校原址经许多老居民指认决不会错，1951年8月政府就买下这一座房子，按原样修复。后来沈子丞同志打听到黄兆（绍）兰校长的女儿黄允中在武汉工作，我们发函请她来上海核实博文女校校址，指导恢复内部原状。她于1952年7月20日来沪。当年她也在博文女校读书，她确认校址不误，对当年校内的布置作了说明，给我们工作帮助很大。

原来住的是一块宝地

杨淑慧经过几次踏看，“一大”会址终于从“影子”中清晰，慢慢地深化而确定了。就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大门沿街是望志路，后门弄堂在贝勒路。当时的106号不是杨重光同志文章里所说的酱园，而是一家卖机器摇面条的小铺子，店号叫“恒福昌面坊”，楼上还有两户居民。当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时，大家拍手大笑说：“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我们告诉大家：“这里要作纪念馆了，要请大家乔迁。”大家都表示：“这是应该的，应该的。”于是我们将望志路106号及其左右房子和老渔阳里2号，请房管部门协助动迁，动迁工作很快就完成了。



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中共一大会址内景（当年的会议室）

找到最早的团中央机关

一天，姚溱同志又打电话问我工作进展情况，我作了简要的汇报，他指示还要找一处最早的团中央的活动机关，对外是外国语学校。事后我问杨淑慧当年党办过一个外国语学校在哪里，她说她知道，是陈独秀办的，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6号，离陈独秀家不远。说着我们就来到霞飞路，渔阳里的里名没有了，但细看还可以看出“渔阳里”三字的痕迹，庆幸的是弄里门牌没有改，我们很快找到了6号。于1956年动迁5、6、7号三幢房子的居民，1957年年底按原样修复竣工，并恢复“渔阳里”里名。

“一大”会址在恢复原状时，我根据《往矣集》等有关资料，把会议桌椅安排在客堂楼上，直到1956年2月12日董必武同志来馆视察时指出：“是在楼下开的，当时楼上住的是家眷，不可能在楼上开会。”这样我们就把会议桌椅搬下楼来。1964年以后李书城的夫人又来上海时，我们问她当年开会是在楼上还是在楼下？她说：“我记得这张大菜台子没有搬到楼上去过。”这样就完全证实“一大”是在楼下开的。

当“一大”会址找到以后，我还请陈望道同志来看过，请他核定“一大”会址。他看了之后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说：“我实在记不清了。”也请过李达同志，当时他是湖南大学校长，他看后谈了许多党早期的活动情况，与“一大”直接有关的只有一点，就是“大会开到第四天晚上，法租界的密探闯进会场，说是找人找错了门，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很机警，问大家认识此人否，大家说不认识，他说一定是密探，赶快休会离开会场。大家从前门走出，来到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家里，当时我也住在那里，大家商量明天开会要换个地方，因为我太太从小在嘉兴，她建议到嘉兴南湖去开，大家都同意，于是我请太太先去南湖雇船，我们分两批去装作游湖模样，在船上开完了大会”。他对找到的会址没有异议。

1951年10月8日市委通知：“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三

处为纪念馆，并成立以夏衍同志为首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等同志，负责设计并领导这三个革命纪念馆的工作。

征集史料前后

1952年冬天，文化部文物局王冶秋同志来沪视察三馆，指示遗址应按原状恢复，有关史料不要在遗址内陈列，并建议做三个模型送中央宣传部。

为了征集资料，沈子丞同志从中华书局图书馆里找来了毛泽东和恽代英两同志亲笔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调查表》，毛主席的表是1925年11月21日填的，在表里对中国革命的主张阐述得很清楚，时间比《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要早四个月。我将毛主席的那张表拍了照片，交夏衍同志请示中央将来能不能公开在纪念馆陈列，不久夏衍同志来电话说：“中央同意公开陈列。”杨重光同志文章里把此表说成是“志愿书”，错了；说此表是从原亚洲文会“日本投降前日本特务机关秘密存放在那里的我党建党前后的文件、资料和出版物”中发现的，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亚洲文会博物院是我接管的，我最清楚，在博物院里有一个图书馆，确实收藏有日本特务机关“满铁”的档案，其中都是我国军政情报，根本没有此表，此表明明是沈子丞同志从中华书局图书馆里找到的。现在成为“一大”纪念馆的一级文物，同时找来的还有一张我军的军用地图，后来调给北京了。

三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做好已经到了1953年了，由沈子丞同志于6月19日送达中央宣传部，沈回来说王冶秋、胡乔木同志都看过了，他们说模型做得很好，并传达毛主席看过后说：“叫包惠僧去上海看一看。”包惠僧是当年“一大”的参加者，当时任国务院参事。1954年3月，中央宣传部请包惠僧及薛文淑（李书城的夫人，当年“一大”会址的房屋主人）专程从北京来到上海，我陪着他们去三个地方都看了一遍，回到宾馆包惠僧滔滔不绝地讲了几天的，这就是他后来写的《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

(二)《《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见闻》等。薛文淑则对当年她家室内的一切布置作了详细说明，我们根据她的口述作了记录。还通过她找到了她房内的一只茶几、一把椅子，据说是当年的原物。他们对已确定的三个馆的原址都认为是对的。

670万人走向兴业路

朱 诚 徐承祖

上海兴业路，是一条小小的马路。近40年来，就是在这条小小的马路上，陆续涌来了670万人。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流，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吗？

1921年，这里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了。

一位美国人詹金斯·索罗门称这里是“奠定历史的地方”。不错，兴业路，是奠定中国历史的路。

大年初一的客人

1921年7月，董必武同志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到上海出席了“一大”。35年后他重游旧址，自是万分感慨。

那是在1956年2月12日，正是大年初一，董老选中“一大”会址来拜年。上午9时，董老健步走入纪念馆，神情庄重，目光柔和。由于当时纪念馆建馆不久，资料不全，当事人的回忆有误，故误将“一大”会址布置在兴业路78号（原望志路108号）楼上。董老登楼仔细看了会议室的布置，最后进入76号（原106号）客堂。他环顾客堂四周之后，别转头对陪同的周馆长说：“当时，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接着，他又说：“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开会呢？何况那时的会议又有外国人参加。”

之后，纪念馆根据董老的意见，进行了严谨的考证，确定“一大”会址